



# 一座山的坚守

■ 曾玉平

在海南,五指山是闻名的。尤其是李双江那首《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》,更是让五指山家喻户晓。在海南过冬已经好几年了,五指山路过,但还真没上过。倒是最近去的母瑞山,令我思绪万千,激动不已。

或许,有些山的名气在歌声里、在风景中,而有些山的分量,却在历史的深处、在人们的记忆里。

冬日的暖阳透过车窗,在颠簸的山路上洒下斑驳光影。我随住地海屯湖花园流动党支部一行五十余人,从屯昌县城出发,向着母瑞山深处行进。作为一名常居海南过冬的退休干部,我常被小区流动党支部邀请参加各类主题党日活动,党员的身份,始终将我们紧密联结在一起。

约莫一个小时候,母瑞山的轮廓在远处缓缓展开。它没有五指山那般奇峰竞秀的张扬,层峦叠翠,沉默地绵延,宛如一幅沉静的水墨画。然而,恰恰是在这看似寻常的静谧之下,却蕴藏着琼崖革命“二十三年红旗不倒”的惊心动魄往事。

纪念园中,王文明、冯白驹两位先辈的塑像肃然而立。流动党支部敬献的花篮缎带,在微风中轻轻飘动。我站在队列里深深三鞠躬。当再次举起右拳,重温那融入生命的誓言时,“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”的话语,在母瑞山青山的环抱中,字字千钧,撞击着胸腔。

步入陈列馆,时光仿佛陡然沉降。一幅泛黄的地图,将我拉回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。1927年,大革命失败后,以王文明、杨善集为代表的共产党人,在琼崖大地上点燃了革命星火,建立了乐会县第四区苏维埃政府。那是怎样的一种抉择?当黑

暗似乎要吞噬一切时,他们偏要在祖国最南端的岛屿上,为光明守住一方阵地。

讲解员的声音平和而有力,把我们带入那段最为艰难的岁月。1932年,琼崖红军第二次反“围剿”失败,冯白驹带领仅存的百余名战士,退入母瑞山深处。8个多月200多个日夜,他们以野菜、野果充饥,用香蕉叶、野藤编成衣蔽体,甚至以草木灰苦涩的咸味来代替食盐。然而,就是在这逼近人类生存极限的条件下,他们依然坚持游击、组织学习、创办“红军学校”。那一簇微弱却不屈的火焰,在深山雨林中顽强地燃烧。

我久久凝视着玻璃柜中那件色泽黢黑、补痕累累的蕉叶蓑衣。它静默着,却比任何呐喊都更有力量。它让“星星之火,可以燎原”这句名言,褪去了抽象的光环,露出了最粗粂、最坚韧的质地。这火种之所以未被狂暴的山风扑灭,不仅在于山的屏障,更在于那“人藏人”的深情。是黎族、苗族的同胞,冒着招来杀身之祸的风险,以性命相托,穿林越涧送来粮食与药品,才让这点微光得以存续、复燃。

琼崖从来不是孤岛。墙上挂着李硕勋烈士的遗像,他的目光从容而镇定。这位来自四川高县的青年革命家,时任中共两广省委书记,受命跨海来琼指导工作,不幸被捕。就义前,他在遗书中写道:“余在琼已直认不讳……在前方,在后方,日死者千人,余亦其中之一耳。”他的血,毫无保留地渗进了海南的土地,与无数琼崖儿女的热血汇流,共同注入中国革命那滚滚向前的磅礴大潮。

而在这股大潮中,那一抹最亮眼、最独特的浪花,莫过于红色娘子军。那些陈列照片中的女子,许多脸庞还带着未脱的稚气,她们毅然挣脱千百年的封建

枷锁,拿起比自身更沉重的钢枪,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第一支完整的妇女革命武装。沙帽岭伏击战的枪声,与后来电影中“向前进,向前进”的激昂旋律,穿越时空,交织成一部关于解放的雄浑交响。那不仅是阶级的翻身,更是性别的觉醒,是人追求自由与尊严的永恒宣言。

从1927年到1950年,二十三年红旗不倒,这是一个奇迹。这奇迹的答案,或许就镌刻在冯白驹那句朴素却深邃的话里:“不是山藏人,而是人藏人。”也书写在解放海南岛战役时,数十万群众摇橹驾船、踊跃支前,那几乎“全民皆兵”的壮阔画卷之中。

信念、坚韧、求实、为民、奋斗……这些词汇,因为附着在蕉叶蓑衣的纤维里、竹筒油灯的微光中、泛黄书信的字句间,以及那些年轻而坚毅的面容上,变得具体可感,有了灼人的温度与沉实的分量。

下午,我们乘车返回。车厢内很安静,来时的低声交谈与感慨,此刻都沉淀为一种共通的默然。我的目光掠过窗外不断后退的景色:依旧是苍翠的山峦,规整的橡胶林与参差的农田,阳光下劳作的农人身影平和。但我知道,目光所及之处已悄然不同。那片土地曾经承受的千钧重量、燃烧的青春热血、珍藏的生死信任,像一层无形却无比厚重的底色,从今日安宁的田园风光下,清晰地浮现出来。

车子平稳行驶,母瑞山的轮廓早已隐没在群岚之后。但那段关于“坚守”的故事,却在心中愈发清晰。它不只是一段需要铭记的历史,更像一把量尺,一面明镜。深山绝境中八个多月的不离不弃,那份“相信”的纯度,在今日或许意味着另一种形式的坚守:在价值喧嚣中守住内心的澄明,在长远征程中保持“功成

不必在我”的耐心。昔日的革命者面对的是生存极限与白色恐怖,今天的建设者面对的是无形壁垒与全球激荡。形式万殊,但其内核所需的那种“韧”,那种源于信仰的定力,无疑一脉相承。

我又想起长眠于此的李硕勋,一个外省青年,将生命的终点定格在遥远的海南;想起那些红色娘子军战士,以柔弱之躯去搏击一个更广阔的世界。他们的选择,都清晰地越过了个体利害的边界,投向了一个更大的、名为“我们”的共同体。这种超越一己之私的情怀与担当,在任何时代,都是点燃非凡事业的燧石。

路旁闪过一座座村庄,白墙彩绘,整洁明亮。这样和丰饶的景象,不正是当年山中将士们,就着野菜吞咽时,心中最具体、最滚烫的梦想吗?他们几乎无人尝到这甘美的果实,却无比真诚地为之播种、浇灌,直至倒下。这份不求回报的纯粹,令人肃然起敬,也引人深思:我们今日的一切,从何而来?

车子轻轻颠簸了一下。窗外,依旧是海南冬日那明媚得令人沉醉的南国风光。但我知道,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。母瑞山的层峦叠翠,连同它所承载的一切,并未随距离拉开而淡去,反而如同一种沉静的陪伴,缓缓沉入心田,成为精神河床的一部分。

这座山,或许不如五指山有名,但它所诠释的“坚守”,却如磐石般稳固,如星河般久长。这趟旅程,仿佛不是去往一座山,而是通过一座山,触碰到了那条浩荡精神河流的源头。河水奔流不息,从过去到现在,再奔向未来。而每一个后来者,都当明了这安宁的份量,以自己的方式,在这河流中奋楫前行,让那“坚守”的火光,永不熄灭。



丝路雄关揽胜

排日扎提·热合曼 摄

## 一炉炭火年岁旺

■ 宋继忠

驻村的日子,常与寒冬相伴。腊月的风穿过村头巷尾,带进凛冽的寒意,却吹不散村里日渐浓厚的年意。乡下人的新年,总离不开一团暖——那堂屋里跃动的炭火,便是年味最温厚的底色。

记忆里,炭火是老屋最暖心的坐标。南方的冬天湿冷刺骨,屋外凝霜结雪,屋内的炭炉便成了一家人的中心。炭炉支架四四方方,中间的火盆形如斗笠,紧凑地安放在堂屋方桌旁。父亲用铁钳夹起乌亮的炭块,层层码好,再引燃松枝;青烟袅袅之后,炭火便从缝隙中透出橙红的光,渐渐晕开暖意。火盆边常煨着一把粗锡壶,那是父亲的酒壶。米酒滚沸时咕嘟作响,白汽袅袅,酒香混着炭木的暖,在空气里交织成温柔的纹路。

母亲闲时最爱守在炭火旁,手边总放着她的“小宝箱”:里面装着她晒好的年糕片、南瓜干,还有藏了半个冬天的红薯、芋头。她常把红薯、芋头埋进火盆边的热灰里,不一会儿,焦黑的外皮下透出滚烫的甜香,掰开是金黄的内瓤,烫得人跺脚却舍不得松口。我们围在炉边,有时趴着看炭火跳跃,有时争抢刚烤好的吃食。笑声落进炭火里,惹得火星噼啪轻响——那点点星火,便成了童年记忆中最温暖的光痕。

炭火旺,年岁旺,这是乡下人朴素的生活道理。炭火不如柴火那样跳跃张扬,却有一股绵长的温热,慢慢烘暖屋子,也烘暖人心,正如乡下人对日子的期盼:不求轰轰烈烈,只愿安稳顺遂,岁岁年年。每到除夕守岁,一家人总要围炉而坐。我们叽叽喳喳讨要红包,父母絮叨着来年的打算,火盆里则被添足了炭块,通夜烧得明亮。爷爷奶奶就着炭火的光,给我们讲从前的艰苦,讲旧日里的甜。他们霜白的鬓角,与我们闪着憧憬的眼睛里,映着的都是同一片炭火的暖。

旧岁的烦忧,随着炭火的余烬慢慢散尽;新年的盼望,便在这炉暖火间悄悄生长。一炉炭火,烧的是人间烟火,暖的是岁月心安,托着的是对团圆的期盼、对日子的祝愿。它以最温柔的方式,见证着四季轮转,告诉我们:所谓“旺”,不过是炊烟袅袅、家人在侧、心向暖处。

愿这炉炭火,年年皆旺;愿人间岁月,总有暖火相伴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永丰调查队)

云栖山舍

张霁 摄



## 红着脸 扎下根

■ 李颖

说起统计,每个统计人都有自己印象深刻的瞬间。对我而言,最难忘的是无数次的“脸红”——羞涩尴尬的红、温暖如春的红、严谨较真的红……每一抹红,都是内心的触动,是角色的校准,是根系深扎的印记,是统计岁月里难以磨灭的过往。

第一次“脸红”:因为“无知”

作为一名统计调查“新兵”,我接手的第一项任务是居民消费价格调查,这可让“不知柴米油盐贵”的我犯了难。初次去采价时,望着琳琅满目的蔬菜、猪牛羊肉,竟有些不知所措。我暗暗给自己鼓劲,好不容易走到一个摊位前,涨红着脸脱口问道:“老板,猪肉多少钱一斤?”老板像连珠炮似的反问:“姑娘,你问的是里脊、前槽、后鞑还是五花?”我顿时语塞,脸更红了——我记熟了采价日期和

流程,却答不上这最实际的问题。看我支支吾吾,老板语气缓和下来,耐心一问一答,总算帮我完成了任务。

那次脸红之后,我明白了:调查的学问不在书本里,而在烟火缭绕的集市中,在风吹日晒的田埂上,在万家灯火里一次次叩门走访的足迹间。

第二次“脸红”:因为“共情”

有一年,我有幸被抽调参加国家脱贫攻坚普查。我们负责的村庄山高路陡,入户走访的道路崎岖难行,每天披着晨光出门,踏着星光返回。

万事开头难。让我印象最深的,是走访的第一户人家。本来还担心能否顺利“开门红”,没想到一进整洁的院子,一位大爷就热情招呼我们进屋。我一项项耐心讲解普查内容,仔细核实、登记。大爷十分配合,连连说:“你们大老远来,辛苦啦!”听得我心里暖烘烘的。普查快结束时,我问:“大爷,现在的生活和从前

比,变化大吗?”他抽着烟袋,满足地说:“现在政府给咱兜底,生病有医保,都是党的政策好啊!”临走时,大爷用那双布满老茧的手捧出一捧杏仁,说:“自家打的,不值钱,就想让你们尝尝。”我和同事再三推辞,却拗不过他的盛情,只好接过几颗。那一刻,我的脸又红了。

那一瞬间我懂得了:做事的温度不是问卷上简单的“已完成”,而是从心底出发,与调查对象感同身受。这份共情,如一束暖光,照亮了民生温度与数据深度的双向奔赴。

第三次“脸红”:因为“较真”

还记得有一次,我和同事到一家个体户开展调查。店主是位大姐,随口报了几个数字,甚至让我们自己填写。性急的我看在眼里,急在心里,脸一下子红了。我赶紧提醒自己别着急、别生气,一边和大姐聊经营状况,一边观察进店顾客的消费情况。大姐嘟囔着:

“你们也太较真了,真是不容易。”我笑着解释:“大姐,这几个数字看着简单,汇总起来反映的是咱们个体户的整体情况。”随后,我们针对性地开展普法讲解。大姐渐渐打消了顾虑,如实填报了准确数据。

这次脸红让我体会到:“较真”是安如磐石的“不妥协”,是原则面前的“不退让”,更是统计调查人用专业与细致守护的“生命线”。

回望来时路,细数年轮,仿佛又看见演讲比赛斩获佳绩、意气风发的自己;看见交流会上分享经验、从容发言的自己;看见顺利完成调查任务、被群众真诚接纳的自己……每每此时,我依然会脸红,会心潮涌动。是啊,这一次次的“脸红”何其珍贵,每一次都记录着我的成长,每一次扎根都让我更加坚定地守望着这片需要我们、也成就我们的统计沃土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秦皇岛调查队)